

從日本第一到中國發展之謎

——傅高義專訪

- 任軍鋒

傅高義 (Ezra F. Vogel)：哈佛大學社會科學亨利·福特二世 (Henry Ford II) 資深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創始人，哈佛美日關係項目負責人。克林頓 (William J. Clinton) 政府時期，傅高義擔任國家情報委員會屬下負責東亞／太平洋情報事務的官員 (1993-1995)，當時該委員會主任是現供職於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奈 (Joseph S. Nye) 教授。

傅高義是英語學界繼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賴世和 (Edwin O. Reischauer) 之後亞洲研究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研究領域的一代名宿，是當代英語學術界唯一一位兼通中文和日文，且對中國和日本社會均有開拓性研究的學者。1958年，傅高義即圍繞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在日本開展田野調查，該調查報告後來以《日本的新中產階級：東京郊區一工薪男子及其家庭》(*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為題出版。1961年，傅高義開始研究中國社會。依託設在香港的大學服務中心 (1963年成立，1988年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傅高義先後完成了與鮑大可 (A. Doak Barnett) 合著的《共產黨中國的幹部、官僚機構和政治權力》(*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以及個人著作《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中譯本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教訓》(*Japan as*

*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交換學生、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戰偉萍博士幫助錄音並整理了訪問初稿，特此致謝！感謝傅高義老師為此次專訪所付出的精力和耐心。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中譯本包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等；此書兩個台灣版的中譯書名均為《日本第一》，由長河出版社和金文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可以說是傅高義的顛峰之作，該書對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及其對美國的挑戰做了深入的分析，在美國、日本以及東亞許多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從國家政要、商界領袖到學術界乃至公共輿論，該書提出的問題一時間成為討論的焦點。在美國，該書精裝本售出4萬冊，平裝本銷售量則達到10萬冊；而在日本，該書的日文版銷售量達70萬冊，連續數周高踞銷售榜之首。傅高義坦承，《日本名列第一》是一部最能代表自己學術個性的作品。作為一位畢生致力於研究亞洲問題的學者，傅高義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職責在於使美國人能夠用同情且現實的眼光認識亞洲的文化與社會，只有這樣才能發現其他社會的長處，從而為改進美國社會提供必要的鏡鑒。作為該書的續篇，傅高義1985年出版了《日本的成功與美國的復興——再論日本名列第一》(*Comeback, Case by Case: Building the Resurgence of American Busines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中譯本包括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版等)，就美國如何應對日本的挑戰提出了具體的對策建議。1987年，傅高義接受廣東省政府的邀請，對改革開放中的廣東做了為期半年的實地調研，並在此基礎上寫成《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中譯本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與二十年前出版的《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書構成一個整體。通過這兩部著作，傅高義力圖擺脫西方學界對紛繁複雜的中國社會做一般化處理的研究方法的局限，從地方史角度深入考察中國政治、社會變遷過程。1990年代，傅高義的主要著作包括：《亞洲四小龍騰飛之謎》(*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中譯本包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等)、主編《與中國共處：21世紀的美中關係》(*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中譯本由新華出版社1998年出版)。2000年，傅高義完成自己的學術思想傳記《日本依然名列第一？》(*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2000])，也正是在這一年，傅高義從正式教職崗位退休。但他的研究寫作並未因此停止，雖然已年近八旬，但在哈佛有關中國、日本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學術會議和沙龍上，依然能經常看到他矯健的身影。傅高義目前正在撰寫有關鄧小平時代的專著，這是他參與編輯的《鄧小平震撼世界：一位親歷者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描述》(*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China's Party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Third Plenum (November-December 1978)*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4])的繼續。近年來，傅高義正在為中、美、日三國學者展開對日本侵華戰爭史的研究積極奔走，在他看來，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

其他國家之間的歷史積怨是東亞和平的潛在威脅之一，而要消除積怨，建立互信，必須從嚴肅的學術研究和真誠的學術對話開始，這一努力的成果即他與袁明、田中明彥合編的《中美日關係的黃金時代(1972-1992)》(*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1972-198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譯本由重慶出版社2009年出版)和《不確定的時代：從天安門到「9·11」的中美日關係》(*The Age of Uncertainty: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from Tiananmen (1989) to 9/11 (2001)*, on-line tex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能不對這位老人的執著產生由衷的敬意；作為中國學者，我們從他那裏可以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

費正清和賴世和都是歷史學家，他們希望我把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中國研究領域，我的研究是在兩位先生的引導之下進行的。他們的視野很開闊，看問題非常宏觀，這可以說是二戰時期那一代人看問題的方法。

按：正文□為任軍鋒提問，◆為傅高義就相關問題所做的回應。

一 觀察中國的歷史眼光

□ 首先，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中接受這次專訪！哈佛的東亞研究在多數中國讀者心目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從1967到2000年，您在哈佛供職達三十三年，對哈佛的東亞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能否請您簡要回顧一下您對哈佛東亞研究的兩位奠基人費正清和賴世和兩先生的印象？

◆ 關於我的學術簡歷你已經知道，我的博士學位是社會學。博士學位沒

有研究東亞，所以那個時候並不認識費正清。我是在讀博士後期間才認識費先生的。費先生和賴先生都是歷史學家，他們希望我把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中國研究領域，我的研究是在兩位先生的引導之下進行的。他們的視野很開闊，看問題非常宏觀，這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一代人看問題的方法。整個戰後世界的全球事務均屬於他們關心的範疇。二戰前，美國並未居於國際領導地位，但是二戰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我們學者



筆者與傅高義教授合照

都覺得重任在肩。費先生和賴先生對二戰時期的中國和日本都有研究，他們不僅力圖了解兩個國家的歷史，而且試圖了解那裏的社會，使我們的決策者多了解問題的背景，對這兩個國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們的目標可以說對我影響非常大。我當然也很佩服兩位先生，他們的確很能幹，他們都屬於大器晚成，有着豐富的閱歷。

□ 在擔任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您曾經積極推動哈佛的中國研究與中國政府和學術機構的聯繫，這些年來，哈佛的中國研究可謂獨樹一幟。在您看來，哈佛的中國學近年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上呈現出哪些新的特點？

◆ 當時我們還不用這個「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而是「東亞研究中心」，第一任中心主任是費正清。賴世和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屬於另外一個單位。哈佛—燕京學社的主要目標是幫助亞洲人來哈佛學習，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研究。而東亞研究中心比較注重研究，特別是近代中國的研究。當時哈佛規定的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所以費先生必須退，要是現在的話他肯定會繼續，跟你們的毛澤東、鄧小平一樣，長期任職（笑）。但是，當時我們有六十五歲的年齡限制，所以費正清退了，需要我來接替他擔任中心主任。

就哈佛的中國學來說，我認為，費、賴兩先生都不大重視理論，也不重視社會學的方法，他們關注的是全面的歷史，包括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都在他們的關心範圍之內。如果用現在的眼光

來看，他們並不注重研究方法，就是學習、了解就行。但是我們這一代是很重視一些理論，至少是學過理論，也學過研究方法，社會學的理论都學過。我自己也關注理論，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理論我也考慮過。但是我認同費先生和賴先生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專家學者而寫作，而是為了有知識、有地位的人，應該讓他們了解。因為我個人有這個目標，所以社會學的專業術語，我不用。而費和賴是不考慮理論的，因為他們沒有學過社會學及其理論。不過我和他們的目標應該說是一致的，即更加廣泛地傳播相關方面的知識。所以我寫書絕對不是為了專家學者而寫的。

如果把哈佛大學的學者跟別的地方比較的話，我們這邊更加重視歷史。一般搞社會學的也不太重視歷史，但我們研究現代的情況，都是重視歷史的，我們主張應該多了解歷史背景，這可以說是我們的研究方法。我個人是做社會學的。像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江憶恩 (Alastair I. Johnston) 都是政治學者，政治學的理论他們都學過，但是他們都注重運用史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政治。可以這麼說，老一代關注的問題要更加全面，新一代接班人是更詳細地研究專門的事情。因為本來人就不多，所以費、賴兩先生的研究領域涉及歷史、社會、政治、經濟各個方面。新一代有專門的政治學、經濟學，也有涉足人類學，更專門化。我個人受到費、賴兩先生的影響，也是由於擔任研究中心主任的緣故，應該說綜合的東西多一些。他們那一代由於沒有很多專門的經濟學、政治學的東西

老一代關注的問題要更加全面，新一代接班人是更詳細地研究專門的事情。我個人受到費、賴兩先生的影響，也是由於擔任研究中心主任的緣故，應該說綜合的東西多一些。

我認為自己的研究起點應該是盡可能多地了解每一個人。有的日本人說我是親日，也有人說我是親中。我的主張是應該多了解情況。希望二十年後，中國讀者能說我寫的東西比較客觀。

能學、能看，所以只是看了很多材料，他們自己動腦筋，考慮全面的事。我這一代因為有很多專門的政治的東西能看，所以我現在搞的綜合研究，是某一方面的綜合研究。

由於我的研究領域是社會學，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是跟人談話，了解他們的思想，了解他們的背景和看法。很多看書的人，不大怎麼跟人談話。博士生學習階段，我接受的一項專門訓練就是如何做訪談(interview)，我與很多專家談話。我認為自己的研究起點應該是盡可能多地了解每一個人。有的日本人說我是親日，也有人說我是親中。我個人的研究方法不應該說好還是壞，我的主張是應該多了解情況。很多美國學者、知識份子，看學生運動，接觸不同政見者，看他們的作品，聽他們的言論，所以很同情他們。我也同情他們，但我不應該說他們就好，鄧小平就壞。我應該多了解他們。那些不同政見者，有不少曾經在我家住過，如劉賓雁、戴晴、王若水等等，李銳也在我這裏待過兩三個禮拜，因為我這裏很方便，所以我認識他們，他們與我一直以朋友相待，我也很佩服他們。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多了解事件的背景，為甚麼鄧小平在1989年要那樣做，為甚麼毛澤東要不斷革命。的確我個人覺得毛澤東是很兇的一個人，在文革、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太過份了，對人太壞了！對鄧小平，我正在寫，很多方面我很佩服他，但是我認為他在「六四」期間，讓軍隊打死那麼多人，我覺得真是太可惜了。我正在撰寫的關於鄧小平的那本書還要幾個月才能完成，我估計在中國大陸

沒有出版的可能，因為涉及到「六四」。可能有人說反正他是外國人，說也無妨。我希望二十年後，中國讀者能說我寫的東西比較客觀。為了理解社會的心理，應該多了解每個人的思想。我喜歡和人打交道，我跟人比較和氣，對先生、對同事都比較和氣，可以說我是比較和諧的一個人。「六四」以後，很多美國人當然很生氣，覺得中國政府這麼壞，應該不讓中國人來美國。但我認為，恰恰相反，應該讓更多的中國人來美國，那樣對中國的前途會更有好處。

二 日本—「四小龍」— 中國：在學習中成長

□ 在《日本名列第一》一書中，您指出，戰後日本所創造的奇迹並非一般所認定的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憑藉新技術的應用和不斷革新，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①。您對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都有深入研究，中國過去三十年在經濟上的積累，除了是由於巨大的農村人口提供的廉價勞動力外，您認為還有哪些內、外部因素促成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在哪些方面可以從日本奇迹中獲得啟示？

◆ 我想政府維持安定團結局面的政策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要是很亂的話中國不會進步這麼快。很多美國人說民主很好，但你看印度，由於社會太亂，許多想投資的人覺得那裏社會不穩定，所以不大想去印度。而中國比較安定，許多外資紛紛進入中國，要是不安定的話，外

資不會進來，因此政治穩定是很基本的因素。我覺得你們的領導人也有自己的計劃，讓學生去學外國的，態度非常積極，讓學生學者學習外國最好的經驗、最先進的技術，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只要是好的都要學。我覺得鄧小平是很典型的，這非常重要。我想隨着中國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還是要給地方更多的自由，因為中國這麼大，如果僅僅依靠1950年代的經濟計劃，不用市場是不可能的，太僵硬，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另外，我還是覺得你們運氣好，華僑這麼多，華僑中有很多能幹的人，他們有知識，有資本，而且很容易聯絡祖國。你看蘇聯，海外的蘇聯人基本是沒有的。你們這麼多華僑，你們稱之為「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台灣同胞」，給你們的幫助，影響很大。

至於中國從日本的奇迹中能學到甚麼，我認為非常多。例如上海的寶山鋼鐵廠就是典型，另外還有電腦公司，中國很多企業的做法，受到日本的影響太大了。鄧小平1978年10月訪問日本，他回來之後即派代表團去日本學習，包括鄧力群等很多人。我想日本在二戰期間也主要是國營企業，後來推行私有化，怎麼樣私有化？其做法自然是值得當時的中國學習的。我們知道，政府計劃一般有兩種，一種是指導性(indicative)的，一種是指令性(mandatory)的。指導性計劃規定一個大致的目標，具體做法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而指令性計劃則規定得非常詳細。本來中國的五年計劃是指令性的，是從蘇聯學的，而鄧以及鄧之後的計劃則主要是指

導性的，我想這是中國從日本那裏學來的。

□ 您曾對日本發展模式作過如下概括：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利用外匯收入購買新的設備、在高生產率部門率先進行技術升級換代和員工培訓、政府主導。這一發展模式與美國的援助、二戰後建立起的不受地方精英宰制的強大的政府、政治和經濟上的緊迫感、充足的迫切希望改善生活的勞動力等條件彼此結合，共同推動了東亞四小龍的迅速崛起^②。中國的發展與日本和四小龍的工業化進程存在哪些連續性？與1970年代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相比，中國的未來發展具有哪些優勢？同時面臨哪些劣勢？中國政府需要在哪些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時避免使社會陷入僵化，阻礙公民社會的成長？

◆ 例如你們從台灣也學了很多。在1980年代，雖然不允許台灣人直接進入中國大陸，但是通過香港的親朋好友可以去中國。台灣已經積累了許多工業化的經驗，中國大陸可以借鑒。中國大陸這麼大，不能簡單地照搬韓國、新加坡、台灣的做法，因為這些國家或地區很小。我想中國是綜合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當然中國本來有從蘇聯學到的五年計劃的經驗。我認為蘇聯模式也有它的長處，雖然後來有人對其批評較多，特別是許多觀察中國的外國人說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已經不行了，但是你看蘇聯在1920至1930年代的發展也很快，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展也相當快，所以我覺得五年計劃也有其長處，當時

指導性計劃規定一個大致的目標，具體做法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而指令性計劃則規定得非常詳細。本來中國的五年計劃是指令性的，是從蘇聯學的，而鄧小平以及鄧之後的計劃則主要是指導性的，我想這是中國從日本那裏學來的。

恐怕中國未來十年面臨的問題在於：中國的組織龐大，投資效率卻不一定高。我認為中國未來的增長率會降低，所以要做好準備，現在很多組織過於龐大，錢都不夠，所以要減少組織的開銷。

需要統籌全國的資源，還有交通、材料、能源等等，全國性的基本計劃在當時有積極的作用。我想這些經驗在中國已經有了。但是現代產業的許多做法，組織模式，怎麼利用，我覺得在當時亞洲四小龍要比中國做得好得多，所以中國大陸當時積極向台灣、韓國學習。

中國未來發展所具有的優勢，我想中國的優勢是人才多，包括你們重點大學的學生，學的是全世界最好的經驗和最先進的技術。你們一批批的政府官員來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他們也很能幹。我想這樣的培養人才的做法非常好，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共的組織建制要求人們努力工作，聽上面的話。所以我個人認為，共產黨對中國的發展也有好處，黨培養人，也組織人，互相談話，互相學習，是好事情。中國發展的規模大，也有好處，例如中國的手機市場，其規模最大，規模大對生產有好處。中國可以嘗試許多外國的先進技術，比如高速鐵路，中國可以選擇英國、日本、法國或者德國的技術。

至於中國未來發展所面臨的劣勢，當然是貪污腐敗。因為官員的腐敗對社會有非常糟糕的影響。我想目前中國還有很多事情不夠正規化，法律不夠健全，比如徵用農民土地搞開發，辦企業，對徵地農民的補償等等，我想應該更加制度化、法律化，要不然的話這個問題會日益嚴重。我認為高幹子弟利用他們的關係獲得經濟好處是很難避免的一件事。高幹子弟中有的也很能幹，他們通過親朋好友可以做成很多事情。我認為他們所做的不一

定是壞事，也有不少好事。當然他們有時候很過份，也變成腐敗問題。還有一點，中國公司的技術水平、創新能力，不如日本也不如美國。中國的出口大部分還是外國公司出口的，通過外國公司的外包合同，中國自己發展的技術，公司研發的技術還是不如日本、韓國、美國一流的公司。

另外，恐怕中國未來十年面臨的問題在於：中國的組織龐大，投資效率卻不一定高。我認為中國未來的增長率會降低，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做好準備，現在很多組織過於龐大，在美國，哈佛也有這個問題。現在組織的錢都不夠，所以要減少組織的開銷，「精兵簡政」還要繼續搞。雖然現在問題不大，但是幾年後會變成大問題。中國的政府官僚機構太龐大了。政府幫助落後地方，現在還可以，因為錢夠用，但是慢慢可用的錢會不斷減少。

對於政府來說，給社會自由應該多一點，這話容易說，但在實踐中是很複雜的一件事。因為在美國，自由多一點，問題不會太大，但在中國給自由多一點，如1986年胡耀邦給自由多一點，但結果是學生運動、鬧事，問題也很大。所以我想也不會太快給自由的，我認為操之過急效果不好，應該慢慢來。

三 「和諧社會」及其挑戰

- 通過對廣東的研究，您曾指出，從中國農村村落到城市國有企業，中國社會原有的社會結構實際上是由

一個個「小而全」的小型單元構成的「蜂巢式社會」(cellular society)，這種社會結構為個人提供了某種歸屬感的同時，也極大地限制了人員的自由流動，令生產要素無法得到有效配置，致使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而隨着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勞動力、商品和資本開始打破原有的人為區隔，開始自由流動，中國開始進入「商品社會」(commodity society)③。然而，商品社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人獲得了自由流動的機會，在滿足人們一定程度的物質需求的同時，也使中國社會矛盾一度空前緊張：由於社會分配的不公所帶來的貧富、城鄉、地區之間的兩極分化，普遍的社會受挫感(social frustrations)和憤世情緒(cynicism)，官與民、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對立一度白熱化，中國1990年代以降持續不斷的「群體性事件」正是這種緊張關係的集中反映。近些年來，新的中共領導層所提出的「和諧社會」主張以及隨之而來的進步主義改革措施，對緩解這一矛盾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在您看來，構建和諧社會，現今的中國政府依然面臨哪些方面的挑戰？

◆最近的事情我沒有詳細學過，不應該算是專家。但根據我的印象，中國政府的三農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農村教育、農業補貼、農村稅收都有很大的改變。有一點我想指出的是，例如在美國，由於國家福利政策，導致一批人不想工作，不願意工作。所以一方面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還要保證他們願意工作，願意學習，願意努力，這個不能一下子搞好，是很長期的

調節，確保他們一直想工作，同時生活水平應有所提高。

你們的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新疆，問題會比較大。政府給他們資金發展是好事，是成功的。但要是給他們自由多一點是不是問題很大，也很難說，很難判斷。經濟幫助已經夠了，但是光靠經濟發展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西藏的問題特別難，印度有八萬跑出來的西藏人，他們可以說是中國的敵人，但他們與住在西藏的人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又不完全一致，所以問題非常複雜。而且，很多人都喜歡達賴喇嘛，我想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假如中國政府要求別的國家元首不要見達賴喇嘛，我想別的國家是不會聽的。

□中國三十年改革使中國社會的基本組織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城鄉之間的人為區隔被打破，超過1.4億農村青壯勞動力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而作為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標誌的戶籍制度雖然不如先前那麼嚴格(如居住證，逐步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但基本上延續下來。您對廣東省的研究發現，正是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使中國城市避免了香港、台北、首爾以及許多拉美城市一度出現的大量的貧民窟現象④。儘管中國避免了城市貧民窟現象，但「民工潮」背後是5,800萬留守兒童，2,000萬隨遷子女，他們的生活和就學難以得到保障。隨着農民工子女進入成年，中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近些年來正在討論改革戶籍制度，甚至有人主張完全取消戶籍身份。您認為中國城市戶籍制度的改革應當如何定位？

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新疆，問題會比較大。政府給他們資金發展是好事，但要是給他們自由多一點是不是問題很大，也很難說。經濟幫助已經夠了，但是光靠經濟發展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各種利益關係變得更加複雜，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也與日俱增，我覺得「和諧社會」的提法不容易引起大多數人的反感，它還有一個對外關係的目標，即避免與其他國家發生對抗，因為中國最需要的是和平發展。

◆ 關於戶籍制度，我與懷默霆 (Martin K. Whyte) 的觀點不大一樣，他主張完全廢除戶籍制度。我想在1980年代，中國城市無論是生活設施還是糧食儲備都不夠，如果沒有戶籍制度，很難想像中國城市能夠接納那麼多農村人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戶籍制度逐步緩和一些，具體我沒有考察現在的情況，原則上我認為應該慢慢來，讓沒有城市戶籍的人生生活好一點，自由多一點，學校也應該逐步讓他們的孩子有機會就學。根據社會能力、城市能力，逐步穩妥地改革，五十年以後，我想中國可以不要戶籍制度。你們的人口這麼多，城市的確是很不容易。中國的事情確實要有足夠的耐心，我認為你們的政府具有這樣的素質。

□ 二十世紀的中國大致經歷了三種政治文化類型：即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王朝國家到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再到以鄧小平理論為核心的官僚資本主義。三種文化類型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彼此疊加，相互糾纏。而在中國當代思想文化領域，與這三種文化類型分別對應的則是文化保守主義、新左派、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爭執不休。您認為這三種政治文化類型是否有可能形成「交疊共識」？「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是否是這一努力的良好開端？

◆ 中國當代思想文化領域的爭論我了解得很少，但我想無論哪個國家，都要有一些信仰、價值和理想，一些目標。我非常佩服鄧小平，但他

的思想是實事求是，那不是理想。雖然鄧說過要有理想，但他的主要目標是經濟現代化，不大重視價值理想方面的事情。年輕人要有理想，社會要有理想，為人做善事，這種理想鄧小平理論給不了，所以要補充。我佩服鄧所做的事，沒有他就沒有中國現在的成績。但就理想來說，雖然儒學有封建制度遺留下的某些糟粕，但中國年輕一代要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對人要友好，需要理想。我覺得馬列主義也沒甚麼理想，馬列主義也是實事求是，要經濟發展。中國的理想，儒學應該多一些，但儒家倫理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要結合新的情況和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一些外國的理想也可以有，王若水說需要人文主義那一類的。當然每個國家要說某些理想是自己特有的，不是外國的，應該有本民族的東西，不能盲目地全盤接受外國的，自己的理想、信仰、價值並不是為了說服外國人，而是為了自己的自尊，適合自己的情況，自己生活得更加心安理得。理想是甚麼？不能夠局限於談利益，它是利益之外的東西。1992年之後的情況我學得比較少，但明顯的一點是：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各種利益關係變得更加複雜，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也與日俱增，我覺得「和諧社會」的提法不容易引起大多數人的反感，它還有一個對外關係的目標，即避免與其他國家發生對抗，因為中國最需要的是和平發展。

□ 隨着舊的王朝秩序解體，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陷入了長期的政治動

蕩，政治上一度無法建立起有效的組織機制。而中共利用統治中國的前二十年時間便建立起了強有力的組織建制：「在中國歷史上，他們〔共產黨人〕第一次建立了一套足以控制和改造社會的強有力的政治體制。經濟、文化、教育以及農村的主要活動均被納入政府管理的範圍。……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社會主義教育以及文化大革命，強化了該政治體制改造社會的能力。」^⑥作為一位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有着深入洞察的學者，您如何評價中共和毛澤東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地位？

◆ 中共的這種組織能力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時期，治理這麼大的一個國家，的確是很不容易，沒有強有力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強有力的組織一方面能夠動員全國的力量和資源進行經濟建設，另一方面也使中共能夠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在其中各級黨校可以說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對於中共前三代領導人，我有一個很粗淺的看法，統一當時處於「一盤散沙」的中國，的確需要一個像毛澤東這樣的「梟雄」式人物，毛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政治家。但事情都有兩面，在建國初期即1949至1956年，毛澤東應該是八二開，八分成功，兩分失敗。我認為1956年中共八大制訂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其基本精神是和平治國，不搞革命和階級對抗，不強調敵我鬥爭，但是後來中國在他的帶領下走偏了。毛在1958至1976年是二八開，兩分成功，八分失敗。對於鄧小平，我正在寫關於他的

一本書，他應該是九一開，九分成功，一分失敗。1988至1989兩年是五五開，1988年通貨膨脹處理很不好，我認為鄧的所謂「價格闖關」是錯誤的。鄧在1989年發表所謂「四·二六社論」，雖然其中可能有「六四」的背景，我認為也是錯誤的。6月1日之後，當時的狀況已瀕臨失控，鄧和中共官方的選擇餘地已經非常小。江澤民總體上是八二開，八分是成績，因為「六四」後中國的處境一度非常艱難，中國社會內部的分歧、對外關係都需要做很大努力。胡錦濤我不夠了解，因為我個人主要研究以前的事情。

中共的組織能力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時期，治理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沒有強有力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強有力的組織一方面能夠動員全國的力量和資源進行經濟建設，另一方面也使中共能夠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

註釋

① Ezra F.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1.

② Ezra F. Vogel,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83-91.

③④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95-98; 404.

⑤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351.

任軍鋒 哈佛大學中美富布賴特(Fulbright)研究學者，牛津大學太古(John Swire & Sons)訪問學者。現執教於復旦大學政治系。